

闺秀传统与家国情怀

——评魏爱莲《小说家族：詹熙、詹垞与晚清女性问题》

崔文东

魏爱莲成功地打破文学与历史的边界，在结语中，她将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并置，描绘了一幅闺秀演化图。如此一来，她也打通了明清文学与晚清文学研究：闺秀传统的转型与女权论述的兴起相联系，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与晚清新小说相对接，不变的则是詹氏家族对于女子才华的推崇，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。

纵观晚清小说研究现状，学者的取径不外乎两种：一是现代文学研究者溯源而上，追索晚清小说的现代意义，譬如陈平原教授的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(1988)、王德威教授的《被压抑的现代性：晚清小说新论》(2003)，皆为此类研究的典范；一是明清小说研究者顺流而下，致力于探讨古典小说的新变，韩南(Patrick Hanan)教授的《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》(2004)乃是其中翘楚。魏爱莲(Ellen Widmer)教授作为韩南教授的高足，其研究轨迹也发生了从明清到晚清的转移：早年完成的专著《乌托邦的边缘：〈水浒后传〉与明遗民文学》(The Margins of Utopia: Shui-hu hou-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ty, 1987)由陈忱的《水浒后传》切入，综合了小说续书与明遗民研究；近年出版的著作《美人与书：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》(The Beauty and the Book: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-Century China, 2006)，关注的是清代闺秀与叙事文学(尤其是小说)的因缘；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刊行的《小说家族：詹熙、詹垞与晚清女性问题》(Fiction's Family: Zhan Xi, Zhan Kai, and the Business of Women in Late-Qing China)一书，则是她晚清小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。

相对而言，《小说家族》涉及的晚清新小说、女权论述、社会改良等议题更契合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旨趣。魏爱莲却另辟蹊径，将明清文学研究的思路纳入书中。她独具慧眼，以家族史为视域，研析浙江衢州詹氏家族的文学书写，跨越了王庆棣(1828—1902)、詹嗣曾(1832—1894)与詹熙(1850—1927)、詹垞(1861?—1911?)两代人(也稍稍论及詹熙的儿女)。詹氏家族中，母亲王庆棣、父亲詹嗣曾活跃于道咸年间，魏爱莲将二人的经历与著述视作詹熙、詹垞两兄弟的创作背景，勾勒出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转型轨迹。在此基础上，魏爱莲突出詹家两代人对于女性问



卫斯理安大学中国研究教授 魏爱莲

《小说家族：詹熙、詹垞与晚清女性问题》(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)

詹垞的两部改良主义小说《中国新女豪》与《女子权》，均浙江图书馆藏

题的持续关注，揭示家族文学事业如何上承清代闺秀文学传统，下启晚清女权论述，将明清与晚清女性研究融为一炉。

不过，即使读者对学界潮流所知不多，仅从钩沉辑佚的角度考察《小说家族》，也足以增进对于晚清文学的了解。曾几何时，《小说家族》的研究对象湮没于厚重的历史尘埃中，我们跟随魏爱莲的笔触，有幸窥见詹氏族人的真容：母亲已非泛泛之辈，王庆棣与袁枚的女弟子酬唱往来，文名颇著；兄弟亦是一时俊彦，詹熙、詹垞熟识邹弢、吴趼人、李伯元等晚清知名文人，先后投身上海新闻出版业，其著作亦流行一时。由此可见，魏爱莲虽然以家族史

为视野，但并未画地为牢，她藉由再现两代人的交游网络，彰显文学书写与时代的互动。

正是在前述思路下，《小说家族》娓娓述说詹家两代人的文学事业。除却绪论(第一章)与结论(第七章)，全书主体包括五章。第二章关注王庆棣与詹嗣曾的生平与诗词创作。魏爱莲指出，王庆棣实为典型的江南才女，她年少成名，无论是《织云楼诗草》(1857)，还是其唱和网络，在在显示她与闺秀传统的关联；詹嗣曾则是颇为常见的传统文人，早年困顿场屋，后为左宗棠门下幕僚，闲时吟诗作赋，留下《扫云仙馆诗钞》(1862)。两人文采风流，乍看仿佛明清女性研究者所谓

“伙伴式婚姻”(companionate marriage)的典范(参见高彦颐著、李志生译《闺塾师：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)，魏爱莲细读他们的诗作，却发现这对夫妻绝非琴瑟和谐。——两人聚少离多，王庆棣独力支撑家庭，难以抑制怨怼之音。王庆棣似乎将自己的抱负寄托于文学创作中：她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公开刊刻个人诗集；她又借助儿子詹熙的交游网络，将诗作发表于上海申报馆的文学期刊《四溟琐记》(1875)之上，从而涉足商业出版。凡此种种，皆开风气之先，显示詹氏家族重视女子才华，亦反映闺秀传统遭遇变革。

第三至第六章转向詹氏兄弟。魏爱莲先探析哥哥詹熙的生平及著作，尤其是白话章回小说《花柳深情传》(1897)。经由韩南教授的研究，学界对这部作品已耳熟能详(韩南著，徐侠译《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)。1895年，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发起征文，号召创作小说以批判“三弊”——缠足、鸦片、时文，进而改造中国社会。詹熙的小说并非参赛作品，但明显是对征文的回应，可谓新小说的先声。小说主体围绕衢州魏氏家族在太平天国前后的遭遇展开，描述沉溺于“三弊”的魏家兄弟如何幡然醒悟，期待警醒读书人。魏爱莲勾稽出詹熙的经历，作为解读小说的前提：早年于上海卖文为生，甲午之后忧心家运，从事小说创作，随后返乡投身女子教育事业，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士绅。魏爱莲随后细绎文本，发现詹熙在创作小说时既依据了詹氏家族的历史记忆，也注入了自身的改良愿景。就前者而言，小说中詹家在太平天国时期的逃难经历，与詹嗣曾、王庆棣夫妇的相关诗作相对应。就后者而言，詹熙着力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家女仆雪花：她保留天足，年富力强，于战乱中救护魏家女儿阿莲，又于战后主持家务，重振家声；在她影响下，魏家女性纷纷放足，雪花也成为魏家二公子

侍妾。现实中，詹熙与他的子女詹麟来(1877—1919)、詹雁来(1891—?)于数年后在衢州倡导天足，推动女权，兴办女学，竟然将小说转化为现实。颇具意味的是，维新志士詹熙寻得了改造社会的良方之后，也就全然放弃了小说创作。

全书的重头戏是关于弟弟詹垞的研究。魏爱莲以三章篇幅分别讨论其生平与花谱创作、小说创作，以及报章文字。与兄长詹熙不同，詹垞完全融入了洋场文人的世界。他大概于甲午战后离开家乡，长年寓居海上，既流连于青楼妓馆，又担任报章主笔激扬文字，最后客死异乡。最能展示詹垞“风流才子”形象的作品，莫过于《柔乡韵史》(1898)、《花史》(1907)、《花史续编》(1907)等花谱。魏爱莲认为詹垞继承了《板桥杂记》等狭邪笔记的书写传统，又引入时代思潮。较早问世的《柔乡韵史》依然不脱访艳指南的套路，为文人寻花问柳提供津梁。随后的《花史》正续编则翻转此一传统，面向女性读者写作，沾染了启蒙色彩：这些风尘女子小传的传主不仅文采斐然，而且富有公德心与爱国心；她们创办学校，赈济灾民，反对西人侵占路权，简直令传统闺秀相形见绌。与之相应，三部作品背后的书写者形象也发生衍变，从品鉴青楼女子的浪荡文人转化为忧国忧民的志士。詹垞此时正在编写《全球进化史列传》(1903)等世界伟人传记，这也证明他在声色犬马之外，从未放弃对维新事业的追求。

与此同时，詹垞借助两部改良主义小说《中国新女豪》(1907)与《女子权》(1907)，宣示了他的“新小说家”身份。詹垞的小说创作比兄长晚了十余年，虽然同样旨在改造社会，但叙事架构已不同于《花柳深情传》，针对的读者也不再是男性文人。这两部小说情节类似，讲述英娘/贞娘接受女子教育，萌生女权思想，投身男女平权事业。两位闺秀或是创办报章，或